

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戚禹林 王丽丽 李丁 刘笑杰 肖人荣¹

(兰州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精准识别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因素对促进我国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重要价值。运用不均衡指数、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及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揭示 2019—2020 年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异特征, 并进一步利用地理探测器探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格局趋于集聚分布且空间分异明显, 总体呈现以京津与江浙为双核心, 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次核心环绕, 边境趋冷的分布态势。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异受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多重影响, 其中经济水平和交通区位的驱动力最大。

【关键词】: 乡村旅游重点村 空间分布 影响因素 地理探测器

【中图分类号】: F592.9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8141(2021)06—0734—07

乡村旅游是依托乡村自然与人文景观资源, 集休闲娱乐、生态观光、农事体验等为一体的村野旅游形式, 在助力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近年来随着我国乡村旅游的井喷式发展, 乡村旅游地的主题同质化、基础设施滞后、土地利用错位、资源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也不断涌现出来, 严重制约着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亟待向特色化和优质化转变。在此背景下,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于 2019 年和 2020 年先后公布了两批共 1000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 并确立了乡村旅游开发和乡村旅游重点村建设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乡村旅游重点村作为发展乡村特色经济与传承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 对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具有引领带动作用 and 典型示范效应, 并逐渐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2]。

国外学者较多关注乡村旅游的供给动机与供需矛盾、旅游地运营模式创新、旅游消费模式、旅游风险投资及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等方面^[3-5]。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 国内学者对乡村旅游的研究视角和学术探讨日益多元。其中, 发展路径主要关注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及优化^[6]、旅游开发模式^[7]、问题与对策^[8]等层面; 旅游地类型与空间分布侧重于从旅游地空间分异特征^[9]、景观空间网络与类型^[10]等角度展开; 旅游扶贫的研究内容涵盖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关系^[11]、旅游扶贫模式^[12]、乡村旅游产业扶贫效益^[13]、旅游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14]等领域; 利益相关者与农户参与主要涉及乡村旅游利益群体构成与利益分配、农户参与与生计影响、利益冲突与合作等方面^[15-17]; 旅游效应评价集中在乡村旅游竞争力、旅游资源利用、产业特征与旅游效应等范畴^[18-20]。此外, 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特征及空间影响也受到研究者的持续关注。研究表明, 资源禀赋基础和自然环境条件是影响乡村旅游地理分布的重要因素^[21, 22], 而经济水平^[23]、交通区位^[24]、客源市场^[25]、政策导向^[26]和运营环境^[27]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特征与结构类型。

总体上来看, 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乡村旅游进行了广泛探讨, 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但已有的研究多集中于微观层面, 缺乏从宏观尺度对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机理进行深入探究, 将自然与人文要素纳入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整体研究框架进行考量更是少见。另一方面, 现有文献多以定性分析为主, 定量化的实证方法较为薄弱, 且较少考虑地理空间要

¹**作者简介:** 戚禹林(1997-), 男, 四川省巴中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李丁(1965-), 男, 四川省彭州人, 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41271141); 香港乐施会基金项目(编号:CHN-0715-02A);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lzujbky-2017-it100)

素的影响。本文以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 GIS 空间分析与地理探测器等空间技术方法深入探讨了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驱动因素, 以为旅游重点村开发建设与发展、乡村旅游统筹管理与决策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

1.1 不均衡指数

采用不均衡指数测算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在八大分区的分布均衡情况, 计算公式为^[28]:

$$S = \frac{100 \sum_{i=1}^n Y_i - 50(n+1)}{100n - 50(n+1)} \dots\dots\dots (1)$$

式中, S 为不均衡指数;n 为分区数, 具体为东北地区(黑、吉、辽)、北部沿海地区(京、津、冀、鲁)、东部沿海地区(沪、浙、苏)、南部沿海地区(闽、粤、琼)、黄河中游地区(陕、晋、豫、蒙)、长江中游地区(鄂、湘、赣、皖)、西南地区(桂、滇、黔、川、渝)、西北地区(甘、青、宁、藏、新);Y_i 为第 i 位的累计百分比。S 值越小, 表明乡村旅游重点村在各区域中均衡分布;S 值越大, 表明乡村旅游重点村在各区域中空间分布越不均衡。

1.2 最邻近指数

最邻近点指数用于判断事物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与分布状态^[29], 计算公式为:

$$R = \frac{\bar{r}_1}{r_E} \dots\dots\dots (2)$$

$$\bar{r}_E = \frac{1}{2} \sqrt{n/A} \dots\dots\dots (3)$$

式中, A 为区域面积;n 为研究区域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数量。

1.3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用于识别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集聚区域, 计算公式为^[30]:

$$g(x) = \frac{1}{nh} \sum_{i=1}^n k\left(\frac{x-x_i}{h}\right) \dots\dots\dots (4)$$

式中, g(x)表示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核密度估计值;n 表示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数量;x-x_i表示估计点 x 到样本 x_i处的距离;h 为带宽;k 为空间权重函数。

1.4 空间自相关

本文选取全局 Moran's I 指数和 Getis-Ord G_i^* 系数, 分析其空间自相关性^[31], 计算公式为:

$$I = \frac{n}{\sum_{i=1}^n \sum_{j=1}^n W_{ij} (X_i - \bar{X})(X_j - \bar{X})} / \frac{\sum_{i=1}^n \sum_{j=1}^n W_{ij} \sum_{i=1}^n (X_i - \bar{X})}{\sum_{i=1}^n \sum_{j=1}^n W_{ij} \sum_{i=1}^n (X_i - \bar{X})} \quad (5)$$

$$G_i = \sum_{j=1}^n W_{ij} \times X_j / \sum_{j=1}^n X_j \quad (6)$$

式中, X_i 、 X_j 分别为 i 省区、 j 省区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密度; W_{ij} 为空间权重矩阵; I 取值 $[-1, 1]$ 。 I 值为正, 表明存在空间自相关, 即乡村旅游重点村呈集聚分布; I 值为负, 表示趋于分散; I 值为 0, 则表示在空间上随机分布。

1.5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主要用于探测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 因子解释力采用 q 值表示^[32]。计算公式为:

$$q = 1 - \frac{1}{n\sigma^2} \sum_{h=1}^L n_h \sigma_h^2 \quad (7)$$

式中, L 为各影响因素的类型数; n 和 n_h 分别为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总数和类型 h 内的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 σ^2 和 σ_h^2 分别为因变量在全区和层 h 的方差; q 为影响因子对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异的决定力大小, 取值范围为 $[0, 1]$ 。 q 值越大, 说明该因子对于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异影响的解释力也就越大。

1.6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 2019 年(第一批)和 2020 年(第二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源于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 (<https://www.mct.gov.cn>); 空间矢量地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19)1698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 底图无修改; 我国 90m 分辨率的 DEM 数字高程数据、河流水系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http://www.resdc.cn/>); 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统计年鉴》。

2 空间分布格局

2.1 空间分布均衡性分析

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 各区域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图 1)。以胡焕庸线为界, 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呈“东多西少”的空间分布态势, 以东占比为 80.60%, 以西占比为 19.40%。从东、中、西三大地带来看, 东部地区占比最高, 达到 40.40%; 西部地区比例次之, 为 30.80%; 中部地区比重最低, 为 28.80%。从八大分区来看, 西北地区、西南地区 and 长江中游地区分列前三位, 占比分别达 17.50%、17.10%和 14.30%; 其次是北部沿海地区、黄河中游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地区, 占比分别为 11.90%、11.50%、9.60%和 9.30%; 占比最少的是东北地区, 为 8.80%。



图 1 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

注:底图来自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GS(2019)1698 号,下同。

本文根据八大分区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统计数据,计算得出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不均衡指数 S 为 0.16。通过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在各区域分布的洛伦兹曲线(图 2),发现仅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占比就高达 34.60%,表明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在空间上呈非均衡分布态势。本文利用 ArcGIS10.2 软件对乡村旅游重点村进行了邻近指数计算,发现我国 1000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最邻近指数为 0.74,进一步说明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呈凝聚型分布态势,空间上表现出显著集聚特征。从八大分区来看,除西北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外,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状态均为凝聚型,其中北部沿海地区凝聚程度较高,形成以北京市、天津为核心的凝聚中心,东部沿海地区次之,集聚中心主要分布在江苏省南部、安徽省西南部、浙江省北部和上海市境内;西北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由于自然环境较差、经济发展落后且空间差异较大,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在空间上较为分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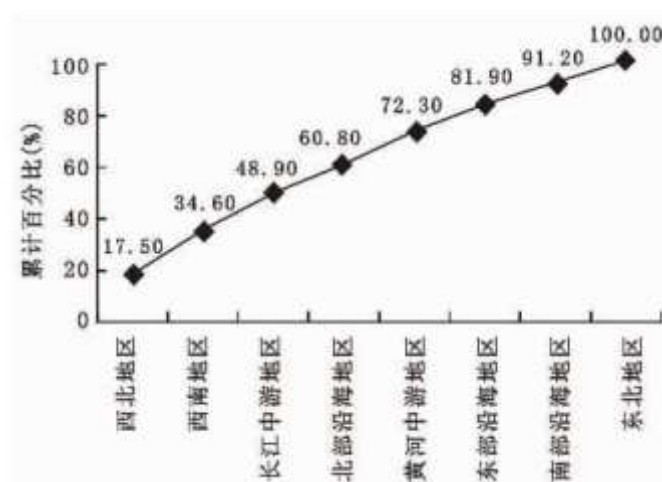


图 2 八大分区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洛伦兹曲线

2.2 空间分布密度

本文以我国省级行政区作为分析范围,利用 ArcGIS10.2 软件对第一、二批以及两批汇总乡村旅游重点村进行了核密度分析,

并采用自然断点法分为 5 类,生成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密度图(图 3)。结果显示,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密度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看,第一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在空间上形成了两个高密度核心区、两个次高密度核心绵延带和两个次高密度核心区。高密度核心区位于江浙皖沪交界的长三角地区和以北京市、天津市为代表的京津冀地区,核心绵延带主要位于太行山东侧的华北平原地区、关中平原、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和川黔渝交界地带,两个次高密度核心区分别位于青甘交界的湟水谷地和海南岛东部地区。除此之外,还形成了 3 个微型核心区,包括以西藏拉萨为中心的藏南地区 and 新疆天山北麓的准噶尔盆地、辽吉两省东部的长白山地区。第二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形成两个高密度核心区、两个次高密度核心绵延带和 3 个次高密度核心区。两个高密度核心区与第一批保持一致,分别为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核心绵延带主要位于太行山东侧的华北平原、陕西中部、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和武夷山地区,3 个次高密度核心区与第一批相比增加辽宁东部长白山南麓地区。从空间格局总体来看,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核密度分析的高值区在很大程度上出现在“胡焕庸线”以东,这符合乡村旅游重点村作为休闲观光场所,聚集在社会经济发展较好和人口更多的东部地区;从地形地貌来看,高值区主要布局在第二阶梯和第三级阶梯,如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从气候类型来看,高值区主要布局在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和温带季风气候区。从降水分布来看,高值区主要布局在年均降水量 400mm 以上的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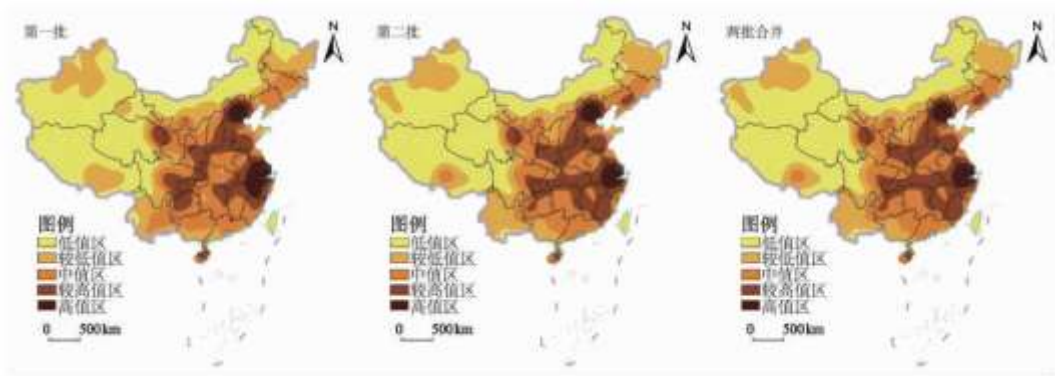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核密度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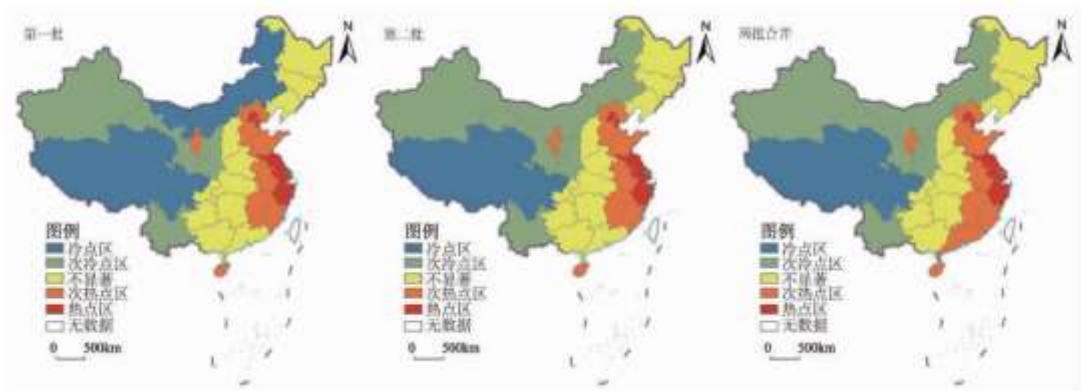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冷热点分布

2.3 空间分布相关性

本文利用 GeoDa 软件计算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全局 Moran’ sI 估计值为 0.215, 正态分布统计量 Z 值为 2.633,P 值为 0.008。这意味着, 在全局范围内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 即乡村旅游重点村密度分布相似的地

区在空间上倾向于临近。相邻空间单元间由于相互依赖而不再相互独立，点在数量相近区域集中分布，并呈现出高低集聚空间特征。

热点分析结果显示，第一批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于京津地区和江浙沪，次热点区分布于河北、山东、安徽、福建、江西、海南、宁夏 7 个省区，次冷点区为以陕西、甘肃、新疆为代表的西北地区，冷点区域为以青海、西藏为代表的青藏高原、以四川为代表的四川盆地和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批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热点地区与第一批保持一致，次热点地区为河北、山东、安徽、福建、海南、宁夏 6 个省区。在第二批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内蒙古自治区跃迁为次冷点区域。从两批乡村旅游重点村总量来看，热点区域集中在京津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总体来看，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热点区域始终为北京、天津、江苏、上海、浙江 5 个省市。这主要是因为京津地区和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密集，乡村旅游重点村易于形成集聚状态，而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则因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人口密度小、对外交通不便，乡村旅游发展较为滞后。

3 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结合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异特点和已有研究成果^[33]，并综合考虑指标数据的科学性、关联性与可得性，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交通因素、文化因素和生态因素 5 个维度出发，构建了由 18 个指标组成的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差异影响因素分析指标体系。本文运用地理探测器对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异特征的社会经济成因进行了测度分析，同时结合 GIS 叠加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影响其空间分异特征的自然因素。

3.1 社会经济因素

人口密度、人均 GDP、居民消费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道路密度、湿地面积、公路营运里程均是影响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特征的主要因素，其解释力大小分别为 0.956、0.852、0.848、0.821、0.715、0.708 和 0.639；其次，铁路营运里程、A 级景区数量、年末人口数、旅游接待人次、固定资产投资额、文盲人口占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和普通本专科在校大学生数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其解释力大小依次为 0.490、0.405、0.354、0.252、0.239、0.226 和 0.210。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从分析结果来看，经济因素对于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的整体解释力较大，其次是交通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与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异有着紧密联系。经济水平因素中，人均 GDP、居民消费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影响力最大，因子解释力分别为 0.852、0.848 和 0.821。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的重要基础，京津冀、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分布较密集的乡村旅游重点村。这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乡村旅游发展越能得到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支持，越能形成更具竞争力和创新特色的乡村旅游地。同时，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化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提升，乡村旅游重点村也能获得更大的市场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规模、质量、发展方向与模式。

在社会因素指标层中，人口密度、年末人口数对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是影响力最大的因子，分别为 0.956、0.354。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为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聚集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密度大有利于乡村旅游重点村获得广泛的客源市场，有利于乡村旅游重点村旅游开发与发展壮大。同时，在人口素质方面，文盲人口占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和普通本专科在校大学生数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解释力大小分别为 0.226、0.210。人口素质越高的区域，对生活质量和对旅游休闲场所的需求也就越大，越有利于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发展。

交通是乡村旅游重点村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在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开发利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交通因素的整体影响力仅次于经济因素。道路密度、公路营运里程、铁路营运里程的解释力分别达到 0.715、0.639、0.490。京津冀、东部沿海地区等乡村旅游重点村集聚区域位于我国交通发达地区，良好的交通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乡村旅游重点村的产业发展和对外

交流。在交通发展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闭塞的交通条件阻碍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壮大。随着自驾游的兴起，良好的交通区位条件对游客的吸引力越大，游客的游玩时间也会延长。同时，交通越便利，与城市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越能获取更大的客源市场，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更有利。

文化因素是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的重要依托。在影响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的文化环境中，A 级景区数量、旅游接待人次、主要文化和旅游机构数的 q 值分别为 0.405、0.252 和 0.196。不难发现，A 级景区数量对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影响最大。核密度分析结果表明，江浙皖地区和京津冀地区是乡村旅游重点村高密度地区，这两个区域传统吴越文化、燕赵文化浓厚，旅游资源丰富，旅游景点数量位居我国前列。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为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不少乡村旅游重点村依托当地旅游景点及传统文化，发展特色旅游。如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镇古北口村、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黄龙岘茶文化村分别依托当地古长城遗址与传统茶文化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差异离不开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因素中，湿地面积对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的解释力较为显著，其解释力大小为 0.708。从乡村旅游发展的特点来看，乡村旅游多以传统农耕文明为载体，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不但为乡村旅游提供了先决条件，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为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生态基础。因此，湿地面积大小在一定程度上是衡量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3.2 自然因素

本文利用 ArcGIS10.2 软件，将乡村旅游重点村与我国 90m 分辨率 DEM 高程数据进行叠加，再利用提取工具，将高程信息按乡村旅游重点村进行提取。具体来看(图 5)，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位于海拔 800m 以下的占比 66.14%，海拔 800—2000m 的占比为 24.76%，2000m 以上海拔的占比为 9.1%。不难看出，海拔较低的区域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密集，而海拔较高的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布局稀疏。海拔高程越低，地势相对平坦开阔、对外交通便利、耕地连片集中，适合人口居住和生活，有利于乡村旅游的发展。而海拔较高的地区，自然环境条件较差、交通不便、对外联系阻碍大，不利于农业生产和人口定居。

本文运用叠置分析法将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与主要河流进行了空间叠加(图 6)，可知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和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流域和珠江中下游流域。河流水系既是村落对外联系的重要交通方式，也可为村落居民提供生活生产用水。良好的水文条件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还创造了优美的自然景观。因此，河流水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重要因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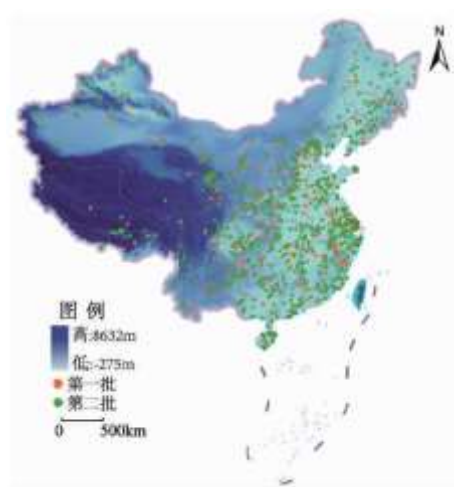


图 5 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区地形地貌



图6 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区河流水系

气候的差异往往决定区域内气温和降水的不同，而气温和降水是乡村旅游重点村农业生产和旅游景观形成的重要因素。由冷热点分析结果表明，乡村旅游重点村主要集中分布于我国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沿海省市。结合我国气候区划可知，京津地区与江浙地区位于东部沿海，受来自太平洋的暖湿季风影响，形成独特的季风气候，降水充沛、雨热同期。适宜的气候条件为农业生产奠定了良好的自然基础，也促进了独特农业景观的形成，因此成为乡村旅游重点村的主要分布区。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基于 GIS 空间分析方法，对两批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地理探测器与叠加分析方法，厘清其空间分布特征和主要影响因素，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极不平衡，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东部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较西部地区密集，胡焕庸线东侧占比高达 80.60%。省域层面上，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分布最为集中。八大区域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较不均衡，地理上趋向集中分布。其中，高密度核心区为长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地区，次密度核心区为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2)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冷热点分布受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空间差异的影响，热点区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主要为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 5 省市，而冷点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内陆地区；从两大批次来看，热点区和冷点区分布范围基本不变，而次冷点和次热点区呈大幅扩展的趋势。(3)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受社会经济因素和自然环境条件的多重影响。社会经济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力较大，其中人口密度、人均 GDP、居民消费水平是主要影响因子；地形、水文和气候等自然因子也在不同程度影响着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结构特征。

4.2 建议

为了促进乡村旅游良性发展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本文从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发展潜力、空间布局优化及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提出以下建议：(1)挖掘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加快乡村经济产业转型。乡村旅游重点村作为乡村旅游利用开发的示范和典型，是促进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重要载体，同时能够引导乡村旅游业良性健康发展，加大对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综合效应研究和建设支持力度，有利于实现乡村转型、乡村重构、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2)优化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结构布局，合理配置旅游空间资源。总体来看，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不均衡的态势，东部地区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要结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乡村旅游开发利用条件，做好乡村旅游整体统筹规划，加大“多规合一”背景下乡村规划编制

探索,走新型乡村旅游发展道路。(3)大力构建旅游交通网络,完善各省区乡村旅游配套设施。交通是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加大乡村旅游公路网建设,全面提升旅游交通设施的完整性和多样性,为打造乡村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提供强有力的交通支撑。同时,加快乡村旅游相关配套设施发展,包括农家乐、乡村民宿、停车场等,全面提高乡村旅游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 [1]陆林,任以胜,朱道才,等.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与展望[J].地理研究,2019,38(1):102-118.
- [2]刘彦随.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地理学报,2018,73(4):637-650.
- [3]Cucari N,Wankowicz E,De Falco S E. Rural Tourism and Albergo Diffuso:A Case Study for Sustainable Land-use Planning[J]. Land Use Policy,2019,82(5):105-119.
- [4]Atun R A,Nafa H,Turker O. Envisaging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Context-dependent Tourism”:A Case of Northern Cyprus[J].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2019,21(4):1715-1744.
- [5]Fatimah T. The Impacts of Rural Tourism Initiatives on Cultural Landscape Sustainability in Borobudur Area[J]. Procedia Environmental Sciences,2015,28:567-577.
- [6]卢小丽,成宇行,王立伟.国内外乡村旅游研究热点近20年文献回顾[J].资源科学,2014,36(1):200-205.
- [7]王慧.旅游扶贫背景下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的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7,38(3):198-201.
- [8]张新成,高楠,何旭明.等.乡村旅游公共服务质量评价及提升模式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34(10):179-186.
- [9]陈天富.美丽乡村背景下河南乡村旅游发展问题与对策[J].经济地理,2017,37(11):236-240.
- [10]于法稳,黄鑫,岳会.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内涵特征、关键问题及对策建议[J].中国农村经济,2020,(8):27-39.
- [11]吴必虎,黄琢玮,马小萌.中国城市周边乡村旅游地空间结构[J].地理科学,2004,24(6):757-763.
- [12]许黎,曹诗图,柳德才.乡村旅游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探讨[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7,33(6):106-111.
- [13]李华强,邹安琼,姚沁.乡村旅游开发中利益相关者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J].农村经济,2020,(2):83-88.
- [14]贺爱琳,杨新军,陈佳,等.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为例[J].经济地理,2014,34(12):174-181.
- [15]史玉丁,李建军.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同研究[J].旅游学刊,2018,33(2):15-26.
- [16]王新越,朱文亮.山东省乡村旅游竞争力评价与障碍因素分析[J].地理科学,2019,39(1):147-155.
- [17]王博杰,何思源,闵庆文,等.开发适宜性视角的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框架——以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为例

[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 2020, 28(9): 1382-1396.

[18]李涛, 朱鹤, 刘家明, 等. 江苏省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及空间差异分析[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7, 36(3): 86-91.

[19]黄震方, 黄睿. 城镇化与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文化研究:学术争鸣与研究方向[J]. 地理研究, 2018, 37(2): 233-249.

[20]杨军. 中国乡村旅游驱动力因子及其系统优化研究[J]. 旅游科学, 2006, (4): 7-11.

[21]席建超, 王首琨, 张瑞英. 旅游乡村聚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与优化——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J]. 自然资源学报, 2016, (3): 425-435.

[22]陈佳, 杨新军, 温馨, 等.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适应性演化理论框架与实证[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7): 1586-1601.

[23]陶慧, 高王景, 陈凯强. 乡村旅游空间变迁:以中国湖北沐抚镇为例[J]. 生态学报, 2020, (6): 633-644.

[24]何琼峰, 宁志中. 旅游精准扶贫助推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思考[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9, 40(5): 721-727.

[25]胡美娟, 李在军, 侯国林, 等. 江苏省乡村旅游景点空间格局及其多尺度特征[J]. 经济地理, 2015, 35(6): 202-208.

[26]李志龙.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机制与协调发展研究——以湖南凤凰县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 38(3): 643-654.

[27]蔡晶晶, 吴希. 乡村旅游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评价——基于社会—生态耦合分析视角[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8, 39(4): 654-664.

[28]韦政伟, 王俊俊, 陈嘉浩. 中国城市群人口—经济时空格局演变非均衡差异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20, 36(18): 81-84.

[29]唐承丽, 郭夏爽, 周国华, 等. 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平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4): 531-541.

[30]丁智强, 高璇, 角媛梅, 等. 基于空间密度函数的哈尼梯田世界遗产地滑坡时空格局变化[J]. 热带地理, 2020, 40(3): 478-486.

[31]钱惠新. 江苏乡村旅游产业空间相关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0, 41(4): 209-215.

[32]王劲峰, 徐成东. 地理探测器:原理与展望[J]. 地理学报, 2017, 72(1): 116-134.

[33]王铁, 邵鹏飞. 山东省国家级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6, 36(11): 161-168.